

後漢書

上册

岳麓書社



95
K234.204.2
3
2:1

古典名著普及文库

后汉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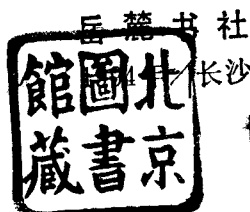
上册

宋·范曄／撰

晋·司马彪／撰

宋衍申／前言

陈焕良／李传书／标点



C

122962

本书点校 李传书
陈焕良
前言 宋衍申
责任编辑 李润英
封面设计 许康铭

后汉书 下册

〔宋〕范晔 〔晋〕司马彪 撰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1994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 630,000 印张: 29 印数: 1-7,000

ISBN7-80520-458-6/K 90

定价: (精) 20.80元 (平) 18.30元

湘新登字 007 号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95
K234.204.2
3
2:2

古典名著普及文库

后汉书

下册

宋·范曄／撰

晋·司马彪／撰

宋衍申／前言

06 陈焕良／李传书／标点



社书
长沙

C

122963

BA27\06

出版说明

范曄编撰《后汉书》之前，就已出现过多部有关后汉的史书，范氏吸取诸家之长，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，才写出了不朽的史学名著《后汉书》。《后汉书》问世，便逐渐取代了前出各家后汉史书的地位，并且后来居上，以其价值与特色，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齐名，并称“前四史”。

《后汉书》行世已有一千五百余年，历代流传的版本不少。岳麓书社这次收入《古典名著普及文库》的《后汉书》，是以百衲本（商务印书馆据南宋绍兴本影印，原缺五卷半，以北京图书馆藏东京静嘉堂文库残册补配）《后汉书》原文为底本，参校汲古阁本（明毛晋汲古阁刊本）、殿本（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）、王本（清人王先谦《后汉书集解》本）以及中华本（中华书局1962年版繁体、直排本）整理而成的简体字排印本，分上、下两册印行。

本书的校勘，主要是利用不同版本来比较异文，择善而从，其中也慎重地吸收各家的研究成果。现就校点工作中的有关具体问题，作如下说明：

（1）百衲本的目录，原将“志”置于“纪”后“传”前，而且编排上有些失序和缺漏，本书依据经过整理的正文，参考各

本，重新按“纪”、“传”、“志”的次序编排了目录。本书目录与所用底本相异之处，不另出校记。

(2) 凡以参校本或其他材料（如诸家考订成果、出土文物新证）为依据校改百衲本时，用小一号的字体加（ ）标出应删改的文字，随后用〔 〕标出所增补或改正的文字。凡增删改乙之处，均在附于下册书末的校记中，简要说明校改的根据。

(3) 繁体字可改为简化字、异体字可改为正体字的，一律径改。原文人名、地名及其他专用名中的异体字，则一般不改，以免歧义。

(4) 底本中的古体字和通假字，一般不改为今字和本字。但如果参校诸本中有用今字和本字者，则据以径改用今字和本字。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原文，特将未改动的古字、通假字摘录若干，并将其相应的今字、本字附注于括号内：

畔（叛）	要（腰）	然（燃）	不（否）
内（纳）	匪（非）	见（现）	邪（耶）
解（懈）	禽（擒）	陈（阵）	旅（簪）
振（赈）	县（悬）	队（坠）	徇（殉）
畜（蓄）	裁（才）	被（披）	离（罹）
辟（避）	欧（呕）	適（嫡）	由（犹）
徵（惩）	讙（喧）	享（飨）	豪（毫）
冯（凭）	冲（充）	决（决）	决（缺）
冶（野）	凌（陵）	凜（凛）	沈（沉）
以（已）	诵（讼）	凶（凶）	予（与）

领(岭) 跳(逃) 罢(疲) 什(十)
景(影) 亡(无) 风(讽) 向(响)
说(悦) 誉(赞) 章(彰) 颀(专)
昏(婚) 爵(雀) 廷(庭) 涂(途)
女(汝)

(5) 底本中同一人名或地名,往往有不同写法,本书正文不求一律,而在下册书末所附《人名索引》中,则将不同写法、不同称谓的同一人名,分别归并于其主目后的括号内,以便读者检索。

(6) 《后汉书》没有留下像《史记》中的“自序”、《汉书》中的“叙传”一类序例文字。在沈约的《宋书·范曄传》中,保存了范曄的一封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,这封家书,反映了范曄修撰《后汉书》的情况和他对这部史书的看法,实际上是作者的自述,表达的都是真情实感,可作为《后汉书》的“序例”来读。此外,梁人刘昭的《后汉书注补志序》、唐代房玄龄等撰写的《晋书·司马彪传》,对了解《后汉书》及其作者也颇有帮助。本书特将二《传》、一《序》附录于下册正文之后,以便读者参考。

最后,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:《后汉书》是一部未经范曄最后完成的巨作,难免存在一些问题。而在千百年来的传写刊刻过程中,积误亦不少。虽经历代学者校勘、订补,但留存至今的某些文字、标点中的疑难问题,仍非一时一地所能断然解决。我们只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,尽可能为当今的读者提供一个既便于阅读与研究,又便于收藏的《后汉书》读本。限于校

点者和编辑者的水平，岳麓本《后汉书》仍难免存在一些不当之处，敬请专家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正。

1993 年 8 月

前言

宗衍申

《后汉书》是我国古代史学名著，“前四史”之一。所记史事为后汉一代，起自光武帝建武元年（25），终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（220），凡195年。全书120卷，其中纪10卷，列传80卷，志30卷。纪、传部分是南朝宋人范曄主持撰写的，志部分是晋人司马彪撰写的。本来，范曄原定写成10纪、10志、80列传，合为100卷，以与《汉书》卷数相合，志这一部分是邀请谢俨收集材料并肯定写成了一部分，但由于范曄被杀，谢俨的手稿散佚，而使《后汉书》的志阙如。到了萧梁时，刘昭为《后汉书》作注，才将司马彪所撰的《续汉书》中的“八志”，厘为30卷，并且也作了注，补入，《后汉书》才纪、志、传完整了。不过，相当长时期，纪、传和志是单刻流传，到了北宋真宗乾兴元年（1022），在孙奭的建议下，才使纪、传与志合刻。

《后汉书》于“前四史”中，成书最晚，这使范曄有条件吸取经验，发挥自己的创造性，写出一部水平较高又颇具特色的后汉一代之史来。

二

范曄字蔚宗，其母如厕产之，额为砖所伤，故小字曰

“砖”。其貌不扬，《宋书》本传载“长不满七尺，肥黑，秃眉须”。他是顺阳郡顺阳县（今河南淅川）人，生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（398），死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（445），终年48岁。

其先为东晋世家大族，祖父范宁曾任豫章（治今南昌）太守，有《春秋穀梁传集解》20卷流传至今，父范泰追赠车骑将军，据《宋书》本传载，泰“博览篇籍，好为文章”。这样的家世使范晔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。范泰有五子二女，前三者为范晔之兄，后三者一弟二妹。（《宋书·范晔传》说范晔为“少子”，《范泰传》则为“四子”，今从后者。）范晔出生后过继给从伯父范弘之，因而得袭封武兴县五等侯，但范弘之对范晔似无甚影响。

范晔才华横溢，《宋书》本传载“少好学，博涉经史，善为文章，能隶书，晓音律”，“善弹琵琶”，对“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”。他恃才傲物，卓立不群，曾撰杂文一篇，名《和香方》，专意讽刺身居要职的同僚庾炳之、何尚之、沈演之、羊玄保、徐湛之、慧琳道人等。对上司，也失尊重，元嘉九年（432）冬，彭城王刘义康太妃薨，举国吊丧，范晔却与几个同僚夜中酣饮，开北窗听挽歌为乐。在学术上造诣很深，追求“自得”（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）。南朝佛教流行，上至皇帝，下至平民百姓，笃佛成风，范泰晚年也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，可是范晔却不信，认为“死者神灭，欲著《无鬼论》”（《宋书》本传）。对古今著述，他也觉得“少可意者”（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）。这样的狂傲，使他招致多怨。

范晔出名早，17岁时，晋雍州（治今西安西北）刺史鲁宗

之就召他做州主簿，但这时其父范泰已投靠刘裕门下，而鲁宗之与刘裕有矛盾，所以范晔未去就职。公元418年，刘裕回到彭城（今徐州），被晋朝廷授予相国宋公，21岁的范晔便被任为相国掾。次年（419），刘裕称帝，不久范晔就任刘裕第四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冠军参军，后又随府转为右军参军。27岁（424）那年，入朝补尚书外兵郎。宋文帝刘义隆（刘裕第三子）即位，范泰因与当权者徐羨之、傅亮不合，辞去国子祭酒之职。两年后（426），文帝杀了徐羨之等，范泰再入朝做官，刘义康这时改任荆州（治今湖北江陵）刺史，范晔再次投靠其门下，任荆州别驾从事史，受到刘义康的厚遇。范晔31岁（428）那年，范泰去世，范晔以忧去职。复职后，任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，领新蔡（治今河南新蔡）太守，这年他33岁。11月，文帝命檀道济北伐魏，范晔惧征战之苦，称脚疾不便行军，文帝不许，令他做后勤，使由水道负责运送部队、军械。还师，命为司徒从事中郎（刘义康为司徒）。不久，迁尚书吏部郎，冬，因太妃薨，听挽歌为乐，被刘义康贬为宣城（今安徽宣城）太守，时年35岁。

受贬后不得志，恰恰这种“不得志”生活，使他官清事约，有时间“广集学徒，穷览旧籍，删烦补略，作《后汉书》”（刘知几《史通·古今正史》）。43岁（440）那年，范晔的仕途又有了转机，被调到始兴王刘浚（宋文帝第二子）部下任后军长史，领下邳（今江苏睢宁西北）太守。刘浚12岁，未亲政事，日常政务全委托给范晔处理，这段工作大概做得比较恭谨，所以两年后（442）升任左卫将军，与右卫将军沈演之对掌禁旅，同参

机密。47岁(444)时,又为太子詹事,转年便以首谋立刘义康为帝之罪名被杀了。

关于范晔谋反被杀事,《宋书·范晔传》、《宋书·徐湛之传》有较详细记载,长时期几乎无人怀疑。到了清朝,王鸣盛在《十七史商榷·范蔚宗以谋反诛》中,首为申冤,认为《宋书》“全据当时锻炼之词书之”都是逼、供得来的材料,不足为据。李慈铭在《越漫堂读书记》,陈澧在《申范》,傅维森在《缺斋遗稿》中都为范氏辩诬。近年又有学者对此问题探讨。较公认的看法是:拥立刘义康为帝事确有,但范晔不是“首谋”,“首谋”是孔熙先,范晔只是预先知道情况,但“轻其小儿,不以经意”(《宋书》本传),属知情不举性质,“首谋”之名是徐湛之等出于个人恩怨给加上的。如果从大的社会背景分析,范晔被杀乃是皇族之间,统治集团之间矛盾的产物。

范晔有文集15卷,《和香方》1卷,《杂香膏方》1卷,《百官阶次》1卷,皆亡。今所存者,除《后汉书》外,只有《双鹤诗序》1篇(见《艺文类聚》90),《乐游应诏诗》1首(见《文选》卷2和钟嵘《诗品诗例》下)而已。

三

范晔生活于东晋、刘宋两朝。

魏晋南北朝是个“乱世”,儒家独尊地位被打破,各统治政权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,把精力由经学转向史学,所以“乱世”反而出现“多史”的景象,而刘宋王朝建立伊始,“役宽民简,氓庶繁息”(《宋书·孔季恭传论》),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、
的环境。宋文帝刘义隆不仅性喜读史,还重视文教建设,他在

位期间，曾命裴松之注《三国志》，又在元嘉十五年（438）设“四学”（玄学、史学、文学、儒学）。在中国，“史学”以独立学科面貌出现，始于此。这时，史学家修前代史（晋史）亦盛，王韶之撰《晋安帝阳秋》，臧荣绪撰《晋书》，徐广撰《晋纪》，谢灵运撰《晋书》（未成之作）。范晔修《后汉书》，除了家学渊源、个人素质外，上述社会背景是不可忽视的。

从史学发展史来看，范晔生活的时代，刘知几所归纳的史书“六家”、“二体”都已形成并得到相当的发展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东观汉记》、《三国志》都为范晔所阅读，他并且早于刘知几对编年、纪传进行过比较研究，据《隋书·魏澹传》载：“范晔云：‘《春秋》者，文既总略，好失事形，今之拟作，所以为短。纪传者，史班之所变也，网罗一代，事义周悉，适之后学，此焉为优，故继而述之’。”（有的学者推测，这段话可能是佚失的《后汉书序例》）

范书之前，有关后汉的史书已有多家，其中可查者就有：东汉刘珍、李尤的《东观汉记》143卷，吴谢承的《后汉书》130卷，晋司马彪的《续汉书》80篇，晋华峤的《后汉书》97篇，晋谢沈的《后汉书》100卷，晋袁山松的《后汉书》95卷，晋薛莹的《后汉记》100卷，晋张莹的《后汉南记》55卷，晋袁宏的《后汉纪》30卷，晋张璠的《后汉纪》30卷等。据清人王先谦统计，范书之前共有18家后汉史书。这些后汉史书，在范晔的眼中都是不理想之作，但是，从材料上和撰写技术上，给范书以参考则是可以肯定的，如果范书不是有诸家后汉史书作参考，后来居上也是难以办到的。

范书出，其它各家后汉史书便逐渐失传，今天了解后汉历史，主要依靠的文献材料便是范书了。

对《后汉书》的评价，有范曄的自述，也有后人的评述。他的自述就是保存在沈约《宋书·范曄传》中的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，这可能是范曄的绝笔之作，都是真情实意，所以可作依据。沈约在《宋书·范曄传》中就说“曄自序并实，故存之”。后人的评价褒贬皆有，但贬少而褒多。对《后汉书》的评价概括起来是两个方而，一是从历史编纂学上，一是从思想内容上。其实二者并非截然可分，只是为了叙述上的方便，才分而为二。

四

《后汉书》在历史编纂学上，既继承《史》、《汉》，而又有创新。

所谓继承《史》、《汉》如前所述，他是在比较了编年、纪传优劣之后，决定弃编年而取纪传的。《史》、《汉》各体，《后汉书》皆效法之。他原计划的纪、志、传，不仅为《史》、《汉》所有，而且还“合为百篇”以与《汉书》篇数相一致。另外，《后汉书》仿《太史公自序》而作《序例》（今天已见不到，一般来说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可视为《序例》读），仿《太史公曰》而作“序”、“论”、“赞”，仿《汉书》不称“本纪”而称“纪”。就纪传体之完备来说，比起以前18家后汉之书确实是“良诚跨众氏”（刘昭《后汉书注补志序》）的。

《后汉书》的编纂，并非只是跟在《史》、《汉》之后亦步亦趋，范曄是从后汉一代社会实际出发，进行创新的。

后汉一代皇后执政屡见不鲜，年幼无知的傀儡皇帝不止一

个，于是《后汉书》为17位皇后（贾贵人、虞美人、陈夫人、皇女附）立“纪”，殇帝附于和帝纪，冲帝、质帝附于顺帝纪。刘知几在《史通·列传篇》中，对《后汉书》这种作法颇有非难之辞，认为“纪后妃六官，其实传也，而谓之纪……其未达纪、传之情乎？”刘知几“名教”思想很重，思想僵化，对范曄这种解放思想，从实而书是不理解的。华峤的《后汉书》也为皇后立“纪”，实际上为皇后立“纪”并非《后汉书》一家。

创立若干类传，是《后汉书》的又一创新。类传，即把同类的人物集中一起来写，《史》、《汉》已有先例，《后汉书》的创新在于根据后汉特点，新增了《党锢》、《宦者》、《文苑》、《独行》、《方术》、《逸民》、《列女》七种。《独行》、《党锢》、《逸民》“正所以表死节，褒正直，而叙杀身成仁之为美也”（《十七史商榷·范矫班失》），《宦者》反映后汉宦官大权在握“剥割萌黎，竞恣奢侈”又“构害明贤，专树党类”的史实。《文苑》正如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·书教中》所说“东京以还，文胜篇富，史臣不能概见于纪、传，则汇次为文苑之篇”。这实际是经学、文学分家现象的一种反映。《列女》记述了17位“才行尤高秀者”的妇女，开“正史”为妇女立传之先河；不仅如此，对蔡文姬这位几次改嫁的妇女不因其于封建名教有缺而另眼相看，这与后来诸史虽为妇女立传，而将“列”改成“烈”，专褒贞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《方术》多记神仙怪异，是后汉社会谶纬流行的一种反映，但是由于当时医术和迷信相杂，郭玉、华佗等名医的事迹，却得以保存下来。

《后汉书》还为品性大体相同者立合传。王充、王符、仲长

统生活时代不同，但他们都淡于功名利禄，并著书针贬时弊，而合为一传。杜根、栾巴、刘陶、李云、刘瑜、谢弼等因仗节能直谏，而合为一传。郭泰、符融，许劭以清高有人伦之鉴，知名当世，而合为一传。邓彪、张禹、徐防、张敏、胡广，都是合光取容者流，而合为一传。还有象《来历传》一类，虽一人立传，而叙谏废太子者同僚17人。这样立传，“详简得宜，而无复出迭见之弊”（赵翼《二十二史札记·后汉书编次订正》）。

《吴汉传》叙其破公孙述之功，则《公孙述传》不复详载其事。《耿弇传》叙其破降张步之功，则《张步传》亦不复详载。宦者孙程以张防诬构虞诩，上殿力争事见《虞诩传》，则《孙程传》不复载。这样，“悉心核订”，就“以避繁复”（同上）了。

《后汉书》对周边民族立了六传，有《东夷》、《南蛮·西南夷》、《西羌》、《西域》、《南匈奴》、《乌桓·鲜卑》。这些传的材料来自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而又超过之，说明《后汉书》在写作中是比较重视民族史料的收集的。

《后汉书》还学习《史》、《汉》，注意保存名家的文章。崔寔的《政论》，桓谭的《陈时政疏》，冯衍的《说廉丹》、《说鲍永》，王符的《潜夫论》，仲长统的《昌言》，张衡的《客问》、《陈事》、《请禁图讖》，蔡邕的《释诲》、《条陈所宜行者七事》，都是关于时政的原始材料。班固的《两都赋》、《明堂辟雍诗》、《典引》，杜笃的《论都赋》，傅毅的《迪志诗》，崔琦的《外戚箴》，赵壹的《穷鸟赋》，刘梁的《和同论》，边让的《章华赋》，崔駰的《达旨》，崔篆的《慰志赋》，都是辞采壮丽之篇，反映了后汉一代文学成就。

范曄在《后汉书》编修计划中，是“欲遍作诸志”的，而且要使诸志为“前汉所有者悉令备”（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），其志向是宏伟的。据《后汉书·后妃纪下》章怀太子注称“沈约（指《宋书》）、谢俨传曰：‘范曄所撰十志，一皆托俨。搜撰垂毕，遇曄败，悉腊以复车，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，已不复得，一代以为恨。’”再从《后汉书》中的《后妃纪》有“僚品佚事，在《百官志》”、《东平王苍传》有“语在《礼乐舆服志》”、《蔡邕传》有“事在《五行志》”的记载看，说明谢俨所作诸志，不仅仅是收集完了材料，而且有相当部分已经成稿，并为作“纪”、“传”者所寓目，只是未保存下来。刘昭将司马彪《续汉书》的“八志”厘为30卷补入，缺《刑法》、《食货》、《艺文》、《沟洫》四志。

《后汉书》的“史论”也是既继承《史》、《汉》又有创造的。它的“史论”由“序”、“论”、“赞”三部分组成。“序”置于《皇后纪》和各类传之前，“论”置于纪、传之后，“赞”置于“论”之后。“赞”写得极讲究，皆为四字句的韵语。范曄对“赞”特别得意，在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中说：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，殆无一字空设”而且“奇变不穷，同含异体，乃自不知所以称之。”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载，《后汉书》的“论”、“赞”曾被单独印成书流传过，可见其影响了。

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评价《后汉书》的编纂说：“简而且周，疏而不漏，盖云备矣。”是中肯的。

五

《后汉书》是一部思想内容特点鲜明的史书。